□史料荟萃

红色根据地「话剧之父」赵品三

（浙江）郭汾阳

美国友人斯诺当年进陕北采访，曾受邀在保安观看“红军剧社”的演出，后来他在他那本闻名天下的《西行漫记》纪实中写道：观戏的人群，“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那里“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所演的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但对观众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由大多晋、陕本地人组成的这种剧团，其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在寓教于乐的艺术（虽然很粗糙）活动中，因为“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了。

陕北的红军剧团，其前身要上溯到开辟草莱的江西苏区；要说根据地话剧运动的先驱人物，也不能不说山西榆次的赵品三。

赵品三于家乡铭贤学校上学时向往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赴大革命的红都武汉，接受党组织派遣与程子华等在国民军开展工作，1929年著名的大冶暴动就是他们策动的。之后赵品三参加红军第5军第5纵队（何长工任政委），何政委知道他喜爱话剧，就让他在政治部担任艺术股长，从此赵股长的拿手好戏——话剧，便在部队中活跃展开。自然，最拿手的演员也是赵品三，不久他上任特务大队政委，然每逢演出也终未脱过场。1930年红三军团扩编组成，各级政治部都有艺术股的编制，文艺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打下长沙后又加入了一批文艺青年，如虎添翼，及一、三军团开赴江西并多次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工农红军学校也成立了俱乐部（以及各大队的“列宁室”），由赵品三负责。俱乐部中有文化、体育、戏剧等管理委员会，其中的“戏管委”，就是由赵品三和热心话剧的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等所组成。那个时期，部队“每周都举行晚会和演话剧，话剧多在露天举行，所以红校一有晚会，除全校学员参加外，四周围的群众也来参加，有时远在十几里路以外叶坪的中央负责同志也来参加”（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演员自有赵品三，“票友”则有何叔衡、蔡畅等。1931年宁都起义后，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进入鼎盛时期，话剧运动也步入高潮，一批“新秀”也脱颖而出，崔音波（朝鲜人）、石淡峰（饰“老太”出名）、石联星（这都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贾耀德、孟陶（这是由改编后的红五军团来的，赵的老乡姬鹏飞就是这支部队的）等，李伯钊、危拱之、刘月华（这都是曾留苏的女学员）则是苏区闻名的“三大赤色跳舞明星”，还有“施家四姊妹”（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以及戏剧泰斗沙可夫、“特科”元勋钱壮飞和胡底、“红校”戏迷伍修权、黄火青、洪水、钟伟剑等。有这样一个群星璀灿的班底，加上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的精心调配，瑞金遂为苏区戏剧中心，而且那已不是简单粗糙的宣传剧和活报剧所能打住的了，它是中国革命戏剧的摇篮和渊薮了。

不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剧团成立，它就是“八一剧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戏剧团体，剧团由赵品三任团长，他也是当时惟一的专职艺术干部，自然就让他来主持和负责了。1931年11月，第一届全国苏维埃大会召开，作为献礼，是几台“名家”出演的话剧，赵品三、李伯钊、何叔衡（时“高法”院长）、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危拱之等等，集一时之选。又不久，成立了直属中央工农政府教育部领导、比“八一剧团”规模更大的“工农剧社”，总社并附设有“高尔基戏校”和“蓝衫团”，赵品三在“总社与红校之间跑龙套”。工农剧社成立开学那天举行晚会，压轴戏即是多幕剧《我——红军》，由赵品三、李伯钊、洪水等主演。后来“工农剧社”组织有“野战剧团”，经常上前线作慰问和对敌演出，前线将士也配合共演，后来人们记忆犹新的是那幕《杀上庐山》，由刘伯承、林彪、罗瑞卿、黄镇、胡底等客串，演到情动处（剧情是红军杀入庐山蒋介石江西行营高级军事会议，将一班乌龟王八蛋悉数擒拿），舞台上下真是欢声雷动。可惜这是艺术虚构。不久，由于王明左倾路线作祟，红军不得已进行长征。1934年秋，被排斥打击留在苏区的瞿秋白临危受命，主持苏区文教工作，他又让同是被留在苏区的赵品三担任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社长。敌人进犯宁都、兴国、瑞金诸地，剧社化大为小，分成“火星”、“红旗”、“战号”三剧团，边演戏边手持梭标、大刀、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来犯的敌人作战，那是最艰难的岁

万方数据

从台湾邮票“古宁头断崖”说起

（福建）郑启五

台湾邮政部门原定于1998年10月16日发行《金门公园》邮票一套四枚，图案分别为“太武山”、“古宁头断崖”、“得月楼”与“烈屿海岸”。事不凑巧，邮票发行的当天因受台风影响，全岛邮局休息一天，故邮票推迟至10月17日发行。邮票画面除“得月楼”外，完全属自然风光，四枚邮票的构图与发行单位所称“配合宣导、推介岛内的观光事业”之主旨完全相符。

作为厦门的集邮者也许对这套邮票另有感触，厦门金门近在咫尺，“太武山”举目可望，而我们对金门岛上的景观仍然陌生异常。本来从厦门到金门旅游与厦门本岛到鼓浪屿观光距离相差无几，登上客轮，不过就是泡一壶茶的工夫，上金门寄几个《金门公园》原地首日封不在话下。然而我生在厦门长在厦门却从来不敢想象踏上金门的感觉。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时至《金门公园》邮票发行的那一天，“两门”正好阻隔了整整49个春秋。

“古宁头断崖”我十分熟悉，当然不是实地游历，而是从一部记述1949年10月24日至26日发生在古宁头的一场惨烈战役的回忆录——《回顾金门登陆战》中得以了解。记得1982年当海峡两岸还处在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状态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阅读了大量当时属于“机密”的台湾报刊和书籍。对于那些密密麻麻的“反动言论”，我不足为怪，因为从懂事的时候起，金门的高音喇叭夜夜对着厦门播送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台湾书籍中关于一次叫“古宁头大捷”的记载却令我惊讶万分，有些描写竟使我彻夜难眠：古宁头断崖前血流成河，人民解放军将士的浮尸在燃烧的木船间……老实讲当时我很希望这些不过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宣传”，但走访了一些老人，他们大都吞吞吐吐，但并不否认解放军在金门失利的事。于是我到厦门图书馆翻查了1949年10月份的《厦门日报》，在该报10月25日的第3版上端，有这样一条新闻——《人民解放军今晨攻上金门》，寥寥数语，却留录了金门战役开战时的捷报，它在末了的一句话是：“本报将继续报道战斗胜利进展的情况。”然而此后三十余年再无任何涉及到这一战役的文字。

厦门集邮协会的顾问、市邮局的老书记李毅波特意送给我一篇原解放军28军电台队长姜从华回忆金门战役的内部文章——《壮士一去不复还》，它记录了1949年10月26日攻上金门的解放军与设在大陆同安莲河的28军前线指挥部的最后一次电报联络：“敌三面进攻，情况十分危急。”此后攻岛解放军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这篇回忆录是我在80年代初见到的第一篇我方有关金门古宁头失利的文字。据我所知，台湾方面对古宁头的宣传在70年代末达

月，也是在那种情况下，瞿秋白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是早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我党文艺方针的一种表达，后来在赵品三的记述中详尽地记载了瞿秋白开创根据地话剧工作的经历，也就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1935年3月，赵品三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被俘，从此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坎坷的岁月。侥幸生还，他一路辗转南北，凭手艺（绘画、撰文）生存，终于回到延安。后来他重操旧业，担任西北抗日剧社总社社长一职，只是在抗日烽火燃遍家乡山西，他才受命告别话剧生涯，前往山西“八办”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关于赵品三，我只听到过不多的传闻，在我少年时每次到北京参观天安门东侧的两座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我就会想起曾经分别是它们馆长的山西前辈赵品三和任行健。我相信赵品三的故事还多，他坎坷而富于传奇的一生是值得有人来大书一笔的。

（责编　启　元）

万方数据